

香港傳真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香港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No. 2005-1

2005年1月6日

重新組織勞動：參與、尊嚴及小康社會主義

倫敦經濟學院政治系 林春

面對我國愈趨嚴重的結構性失業，勞動的社會組織和再組織成為一個主要的政策挑戰。在勞動力總體過剩、工業和技術又不斷進步的中國，全部就業恐怕已不再是現實的目標。取而代之的是許多以前不熟悉的非正規就業及社會參與形式。大量社會性生產和服務的參加者已經或即將不是有以任意義上“工作”、“職業”和工資的人。例如到2003年底420萬青年志願者十年裡服務超過45億小時。儘管這類勞動/活動一向存在，其份量和意義從未像今天這樣重大深遠，以至有可能顛覆一個現代社會賴以安身立命的自我意識和制度定式。

重新組織勞動意味著對生產、服務、貢獻以及消費嶄新的理解，包括正式與非正式、固定與臨時、正規與靈活性、有報償與無報償的工作，志願勞動，及各種其他社會必要的物質與精神性活動。無論在家庭內部還是公共領域，新的勞動概念和形式都會對創造財富、提供服務的分工、過程、性質和經驗產生極大影響。相應轉變

的是勞動者/參與者的眼界、態度、嚮往，乃至個人事業的安排和生活方式。當在不久的將來公眾話題中頻繁出現時間的政治，空間的政治，環境的政治，參與和認同的政治時，一場空前的文化轉型就到來了。近年來歐洲發達國家對“工作的未來”的探討和全球南方“有機發展”戰略的辯論都已開始在混雜著後工業和前工業特徵的中國聽到回聲。在一個各民族相互依賴的時代，勞動的重新組織將是超越傳統意識形態分界和國界的運動。衝破各種阻力，其必爭的方向是個人與社會、發展與環境並重，是崇尚直接勞動者和參與者、非異化勞動、非異化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小康的觀念可為“錢從哪來，人往哪去？”的討論提供別種思路，成為推進這一經濟、同時也是政治和文化運動的突破口。而小康社會主義，作為社會理想和在 21 世紀全球化壓力下尋求民族定位的努力，祇能由中國人民自己根據本土的條件和需要通過政策創新來發現和定義。

失業危機

工作短缺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在祇允許資本而不允許勞動跨國界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尤其突出。在我國，放棄了計劃經濟中維持隱性失業的戰略後，加上國企准私有化的進程，失業率逐年飆昇，2004 年的目標是控制在 4.7% 以下，但國內外專家的統計早已進入雙位數。龐大的人口基數使即使看來不算很高的百分比也呈險象，更別提還有千百萬所謂在業人員既無足夠的事情可做也沒有可靠的收入。至 2002 年底，超過 3000 萬國企工人下了崗，至少 1400 萬人在 2003 年裡仍然沒有工作。約有 1.5 億農村勞動力遊離土地，形成一支實際上（找不到活兒幹的農民工）或潛在的（未來無地又無業）失業大軍。失業壓低工資，削弱需求，轉而阻礙生產，造成“過剩”假象。雖然李嘉圖的“工資鐵律”不能解釋非古典資本主義的

社會契約（例如瑞典或德日模式），但在政府、法律介入缺失或微弱時，勞動力市場上的供給與價格勢成反比。最近廣東一帶出現“民工荒”，正是那裡工資被長期人為壓低，直至不但低於“自然”價格並且也低於市場價格而造成的，可看作資本主義工資規律的反證。歐洲的高失業在理論上被有些人認為是由所謂的工資剛性而引起，無論有無道理，都顯然不是我們面臨的問題。在我國，失業危機與血汗工廠（及拖欠工資等）並行，加上兩極分化、腐敗和不公平等社會問題導致廣泛的不滿和公共抗議。

在土地少（還在繼續減少）、資源匱乏的條件下，中國經濟沒有可能吸收其年均 1200 萬人無盡的勞動供給。不斷擴展的服務業、眾多的基建設施工程、生產率的提昇、新興的（知識）經濟部門、勞務輸出的擴大等等，都不足以解決問題。如果增長是最終的希望，它本身也是一柄雙刃劍：GDP 中生產率的因素會大量削減舊有的工作崗位。國際市場對中國保持其以廉價勞動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和一定程度的“技術保守主義”的壓力絕對真實，但迫於就業壓力而放慢生產率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與產業昇級的速度，對迫切需要經濟獨立、安全的中國，實屬下策。何況，勞動密集型的生產衰落是大勢所趨，因此造成以原料出口和製造業為生的窮國之間的競爭愈演愈烈，亦從富裕國家爭奪工作機會。比如，為了阻擋企業外移和資本外流、惡化本地的就業狀況，2004 年美國勞聯產聯向國會提出事實確鑿的文件（“中國工人階級狀況”），要求對中國坐視外資和民資企業侵犯法定的勞動保護條例，包括最低工資和組織工會的權利，實行經濟制裁。另一政策兩難的例子是老齡化：我國 65 歲以上的人口將從 2000 年的一億左右增至 2007 年將近兩億、直到世紀中的四億。推遲退休年齡會立即加劇已有的就業困難；不推遲又使養老金儲備不堪重負。

在個人層面，失業的悲慘不僅在於物質上的損失和生存困難，

也是精神打擊和摧殘。祇要現存的自尊和尊重他人的價值來源不變，一個下崗工人或進城的“無業遊民”被剝奪的就不僅是其以工作為核心的社會歸屬和用崗位勞動換取的生活收入，同時也是職業認同和勞動中的集體聯繫。這種剝奪造成深刻的挫折感，損害自信和對未來的希望。失業之所以成為危機，是由多種因素結合包括這類文化和心理因素而引起的。

有解決辦法嗎？

必須承認，我國有極大尚未開發出的就業潛能。試想如果法定的 40 小時工作週能不折不扣地實行——最小限度超時作業、關閉各地的血汗工廠，將能騰出多少工作機會？如果真正在邊遠農村地區實現九年教育網和建成初級醫療設施，會需要多大數量的教師、醫護人員、技術員？如果在消除污染、保護資源的原則下積累財富，又可能出現多少新的工種和工作？但另一方面，在現有勞動制度內創造工作機會受到前述各種客觀的硬性限制。即使對低熟練工人及時培訓，不斷轉移其中一部分到熟練和專業崗位，也趕不上勞動密集型“夕陽”廠礦衰落和關閉的速度。即使許多大學生和專業人員也面臨就業難。

那麼，按照著名的孔多塞“人人勞動，全體少勞”（All shall work；all shall work less）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設想，儘量平均分配工作機會行不行？該設想以正式工作是應該共享的公共福祉為前提，因為個人和家庭的物質生活及社會認同都依靠工作及其收入。但這個前提本身是特定歷史和生產方式的產物，依不同的文化和制度安排而存在或消失，並沒有必然的決定性。進一步縮短工作週雖然特別值得考慮，如仍與血汗工廠並行，其重要意義就大打折扣。週期輪流就業則要求複雜的行政運作，造成制度上額外的管理負

擔。資源越短缺，競爭就越激烈，行政控制也就越有必要。結果可能反而助長一個對個性解放和民主管理都不利的強大官僚社會。

因此，從消除“工作”和“有償就業”這兩個概念之間的等號入手（細想難道這個等號不從來就是幻覺？），真正的解決辦法恐怕在俗成以外。經典的例子是家務勞動——婦女解放運動在世界各地已為贏得其應有的社會價值鬥爭了很多年。由此類推，所謂工作應包含所有物質和精神的生產和服務形式，無論發不發工資，無論是否得到市場評價。其中傳統的正式工作之外，還必然包括由兩性分擔、與公共參與和非家務角色相結合的家務勞動，各類非正式工作、靈活時間、自由職業、自我“僱用”、志願義工、互助公益及公民團體活動，以及任何其他公認有價值的貢獻形式。從終日勞作中因技術和社會組織的進步而解放出來的人們將有更多的閒暇發展豐富自己的興趣才能，參與政治和社會討論，也有了更多的時間彼此照顧，形成一種建立在自治合作、社區網絡、義務勞動和多種形式的換工（通常無須貨幣做中介）基礎之上的“關懷經濟”（caring economy 或 solidarity sector）。在這樣的經濟生活中男女平等。在通常自願的基礎上，也不妨有些民主產生的硬性規定用於促進義務和權利的分擔分享（如在德國一些地方對男性參加照顧他人的工作由地方法規來保障）。

此處的關鍵字是“參與”。參與應該入憲，是“排斥”和“歧視”的反題。它涵蓋一切直接和間接的“社會必要勞動”以及一切社會承認的、最寬廣意義上的工作或活動，包括藝術創作和其他有益的精神活動及文化事業。通過參與，人們作為個人和集體的一員進入合作與交換的領域。合格的參與者身份換來他人和社會的尊重。參與由此成為取得人性內在需要的社會尊重的主要途徑。相應的政策目標是鼓勵參與，平等參與，變“充分就業”為“充分參與”，以收入不再與出賣勞動力的行為或勞動的市場價格掛鉤為標

誌。當然，在此我們已經預先設定了參與的正面價值，即一個有合法性公共空間的應然社會（至於“公”“私”領域的劃分重合需另文再議），把法律和道德不可接受的活動除外。各盡所能式的參與同時是權利和義務，與拒絕剝削、不勞動/參與者不得食的原則是一致的。

參與由此與認同銜接，是換取社會承認與尊重的根本資格。參與和認同銜接的物質基礎，則是參與和收入相連。中國發展至今，已同不少發達國家一樣，具備社會開始從繁重單調、負擔性的勞動走向自由的物質條件。可惜在熟悉的文明框架和期望值裡這個空前的機會常被視為負面現象。特別是，如果沒有對全體公民提供的無條件的社會保障，勞動重組與已日益成為特權的穩定的工資勞動為主的制度決裂確實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自由的經濟條件已經具備，社會政治條件卻還不成熟，還需要爭取。祇有在全員社保的基礎上，一個通過無限的參與形式和共享渠道而實現充分參與的社會，和與之相應的倡導各盡所能、平等尊嚴和同甘共苦的社會價值才能實現。

人人有份最低收入

換言之，在我們終有一天能根本轉變把正式就業作為個人/家庭收入和社會認同的基本途徑以前，反對失業的努力必定捉襟見肘，沒有取勝的機會。如果參與加保障的模式聽起來像烏托邦，那不過是因為歷史的生活世界已經在把習慣合理化的過程中融入“自然”的現狀。習慣成自然。掩蓋了的是無可回避的現實，即相比之下，回到靠公開或隱蔽的補貼形式而實現所謂充分就業更是完全的幻想。中國經濟轉型在急劇減少舊式就業模式的份量的同時，

也創造出無數新的和新舊互補的工作和參與形式。後者將逐漸取代前者，並在認識和價值層面正統化，成為“參與”（及民主）話語的關注對象。我們習以為常的以城市就業和固定報酬為天經地義、為“討生活”而上下班與個性追求相分離的“現代”生活方式正在不可挽回地瓦解。

問題是，即使大家都同意不以傳統就業而是以公民身份參與為資格的“社會收入”（social wage 或 social dividend）的道義正當性，或至少其道德論證的現實性，它的物質可能性又怎樣？在實踐上是否可行？首先澄清，公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與定點扶貧的概念不同，與向業主要求“生存工資”（living wage）的概念不同，與用遊戲取代勞動的遠景也不同。它的有限目標是由中央財政負責，以中央和地方依據各地物價和其他相關條件商定並按需調整的水平為準，向所有社會成員發放基本生活費，包括義務教育和傷病救治的費用以及殘疾補助。其形式可交各級人大和媒體組織全民討論。設想央行組建“公民收入分行”，其存摺號碼與居民證號碼一致。公民收入定期自動入賬，可隨時支取，不取部分低息增值。這項支出由國庫保證，不進股市；部分由國家在現行退休金、職工保險、失業救濟、城鄉低保等運作中的投入支付。現行體制則在國家退出後變成公民收入以外的附加保障，仍可存在發展。

政府當前的改革目標是在財政責任和覆蓋面兩個意義上完成社保系統從以單位為主到以“社會”總體為單位的轉變。正式職工主要依靠保險機構，由單位、個人和國家分擔繳納保險金。其他人員除各類保險外依賴地區性和民間各種渠道。城鎮三條保障線的要求是確保退休職工的養老金、下崗工人的救濟和居民最低生活水平。在農村，民政部準備總結推廣上海（該市郊區農民低保已涵蓋400多萬人）、北京（得到最低生活費、養老金和參加合作醫療的

農民共約 200 萬人) 和山東 (1995 年以前曾有 6000 多萬人參加的由地方政府和個人共同負擔的農村養老基金試驗) 等地的經驗, 使全國幾千萬極度貧困人口得到救助, 並逐步建成城鄉一體的低保制度。對農民來說, 土地是最根本的保障, 也是中國革命範圍最廣、影響最深遠的一個成果。2002 年土地合同法重申農戶的土地使用權及臨時外出打工人員保留土地的權利。正如許多研究者指出, 土地的集體所有制已一再證明是中國農村工業和市場化改革的必要條件, 而土地的社保功能又是土地私有化的建議絕不能採納的主因。國家社會保障基金會最近宣佈在未來五年裡現有國資的十分之一將轉入社保儲備, 大約 1200 億元, 人均不足百元。即使計入經濟繼續增長、社保比例大幅增加、生產和消費方式向節能尚儉轉變等因素, 在全面實現公民收入以前, 也需要一個過渡時期。其間一部分農村人口穩定地轉移到城市後可以自有承包土地換取最低收入; 其餘人員則可在人地矛盾減緩的有利環境中就地取材開發, 提高農工副的生產和收入。城鄉繁榮與全國統一提供生活費目標一致, 彼此促進, 實驗推廣。最終在一個新型供給制的基礎之上, 人們可以根據願望和機會、根據各自工作和參與對社會的貢獻而得到國家負擔的生活費以外不同形式和數量的收入。

人人有份的基本收入旨在消除“失業”這個歷史現象和歷史辭彙本身, 為充分參與提供物質保障。與富裕的西方世界比較, 中國雖然在經濟上落後, 其民間的社會資源卻比完全被利潤驅使的資本主義社會富足。儘管追逐利潤也已在中國盛行, 金錢的力量也在腐蝕中國社會, 但我們有自己不可磨滅的傳統。比如互助互利的合作組織, 地方自力更生的能力, 平等的集體主義觀念, 子女親屬在家庭內或就近贍養老人的習俗, 等等。許多傳統中不是沒有負面的東西, 但有選擇地改造利用, 可能支持一種遠比北歐式“福利國

家”靈活、便宜、有效並富有人情的“福利社會”。

實行普遍福利使人們不愁起碼的衣食住行、醫療教育，沒有後顧之憂。這樣的政策不是大鍋飯，因為它志在“保底”，上不封頂。相反，任何朱門酒肉臭，無助的平民卻苦於、乃至死於貧賤的社會都絕不是正常健康的社會，也絕不是經歷過一場以幾千萬人的奮鬥犧牲為代價的偉大革命的國家所能認同的社會。再者，無數局部事實證明，保障和共享能促進集體認同和社會向心力，提高工作積極性和責任心。使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無條件得到滿足就會鼓勵懶惰的說法，是不合常識的階級偏見。畢竟，人是創造性活動的生靈，其“類本質”使絕大多數人追求自我實現而不甘無所事事。可以說參與是人性的內在需求。

阻力與可行性

如果三條保障線和城鄉全面扶貧除貧這樣大的步子能在我國邁出，為什麼公民收入初聽起來像天方夜譚？其實下一步公民收入祇要想得通，就做得得到。當然具體操作要求一系列必要條件，專家論證、計算、公議、轉軌。比如讀書和看病的費用先要降下來。教育投資必須增加，法定的九年義務教育書本費外不應收學費（書本費也應對低收入者和農村居民減免）。我國目前不足GDP 2%的教育投資在不發達國家中也幾乎是最低的。還要解決醫院收費和藥品價格中的問題，不允許再發生駭人聽聞、因無錢繳納巨額押金就被拒收的急診病人致殘致死的事件。改變不少家庭堆放著陳年不用的藥品，而很多人在窮鄉僻壤、被嚴重污染致病的地區及流動人口中卻因買不起藥而忍痛、等死的現象。祇有當公共服務的成本和收費足夠低廉時，國家才有可能承擔每個公民的生存開支。

除了政策準備，還要克服來自我們有限歷史經驗的認識上的阻力。人們首先會問，如果類似的政策選擇在富有國家都要演為稅收上不可接受的負擔，在一個發展中國家又怎麼可能？這樣的問題首先混淆了昂貴的官僚機器（如美國的收稅退稅機構）與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制度安排之間的區別。兩者有重疊之處，但不同之處在於前者遠非僅有的再分配方法，而後者也並不以物質的極大豐富為前提。滿足福利的辦法很多，可有從政府到非政府、市場到非市場、正式到非正式、中央財政到地方集資等各種渠道。源遠流長的本土知識告訴我們，某些基本需求，如公共衛生保健（特別是群眾性防疫使醫藥費用降低）、低/免學費的中小學教育、便宜的大眾交通等等，都曾在比今日中國窮得多的時代得到一定程度有效的滿足。國家財力、包括地方政府的投入以外，曾起到很大作用的還有集體提留、村社自理及各種民間資源。在當前全球化的論述格式裡，過去的經驗失落了不少，對未來的想像空間更被擠佔。其實，祇要不是以一切利潤掛帥，從教條和成見裡退出一步也許就海闊天空。以往數百年的歷史證明，市場本身並不是決定性的。在不同的民族和地區、不同的政治條件下，它可以不同的目標、形式運行並產生全然不同的社會後果。

畢竟，普遍福利的關鍵不是產出和人均 GDP，而是在生產力達到一定水平後財富的利用和分配。經濟史學家們早已經過計算得出結論，就全球整體而言，人類社會的財富自工業革命以後就已跨過全體脫貧的門檻。此後，局部天災除外，貧困的根源一般來說不再是“自然”的而祇能是社會的了（結構失衡、兩極分化、國際關係等等）。除了一些戰亂中赤貧的國家地區，一個負責任、有決心的政府不可能因為財力的限制而承擔不起人民基本生存的費用。尤其在成就了 20 多年高速增長的中國，更沒有理由拒絕通過充分參

與和全民社保來徹底解決失業問題。在人均 GDP 超過 1000 美元、國家財政連續十年以 GDP 兩倍的速度發展到 2004 年收入超過 2.4 萬億元後還認為在生存線水平上養不起所有國人，肯定說不過去。造成社保財政缺口的不是經濟落後，而是政策、管理滯後，貪污瀆職等等。誰都算不清巨額的資產流失和浪費的黑洞有多大。不是沒錢，是錢被花在了不該花的地方或被少數人掠奪。常聽說“投資熱”。投資熱是什麼？是錢太多，是房地產投機，是開發商炒股票。“錢從哪來”？從減少浪費來，從堵腐敗漏洞來，從合理稅收來（如對非生產性投機徵稅，增收對奢侈品、汽油等的附加稅）；也從設計完善、高效節能、勞保防污達標的生產建設來。

說到底，使每個公民得到一份人皆有之的最低收入不是一個經濟實力問題，而是政治和體制問題，思想上求得共識的問題，也是在一個開放市場上國際資本的壓力下如何維護自主的問題。祇要在我們社會裡剝削和利潤還不能統治決策，貨幣金融還沒有被外部力量控制，人的價值還無法單用市場價格衡量，我們就還有能力自主創新。並且，在中國實行社會收入或稱“社會紅利”將沒有或較少在資本主義世界會碰到的技術層面的困難。如果類似的設計在 OECD 國家意味著大幅度提高稅收，因而遭到富有選民的反對，那麼它在有幾千年小康和大同理想、又經歷過初步社會主義洗禮的中國卻可能得到廣泛的支持。其實工資僱傭勞動在農業（甚至整個國民經濟）中一向處於邊緣地位，勞動組織的多種傳統形式曆久未衰，根據路徑依賴的邏輯都是我國的可利因素。

小康社會主義的啓示

在原社會主義國家“公共福祉政權”（public good regime）衰

落之後，現有的小康解讀儘管缺失政治民主和抵抗資本主義整合的內容，但放棄不惜人文和環境代價的盲目增長、強調以民為本，仍不失為一個難得的戰略調整契機。從對勞動和勞動者的再認識和再組織出發，設定任何人都不應失去生活來源、因此也失去施展能力的機會從而個人尊嚴，那麼在一個認同參與、以參與為正當性原則的社會裡，人人都該有個橡皮飯碗。這一訴求與福利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在於兩者對人類自由繁榮和社會正義理解不同。比如主張擴大市場自由的 Milton Friedman 相信通過降低工資、減少政府干預、加上以對窮人負稅收為機制的安全網，就能重新實現充分就業。社會民主黨人則注重通過再分配來補償失業者，忽視生產過程。兩派都不能超越傳統的就業模式，也都認識不到祇有一個全面參與和保障的社會才不會允許在有勞動能力的公民中劃分出遭受歧視的“消極”或“寄生”的一部分人。

在充分參與的意義上闡釋小康，以下幾點值得特別注意。首先，現行能源高消耗、出口導向、依賴外資的增長模式必須轉向眼光長遠、和平安全、可持續的發展戰略。否則僅國際市場上油價這一項就能把我們卡死。捲入未來爭奪能源而引發的戰爭的危險勢在必防。這樣的戰略轉變意味著放棄靠“廉價勞動”來積累資本，控制某些與國際接軌的“產業支柱”（如汽車工業）和消費模式；也意味著讓“需要”的邏輯對利潤的邏輯取得優先權。結果將是一個新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組織模式，其中“總需求”、“總供給”、“投入產出”、“生產”、“消費”、“城市化”、“工業化”等熟悉的概念都要重新定義。小康模式追求一個更人性（而非生產線上活的機械部件）、更有創造力、更機動靈活也更能開發人的潛能的生產方式，減少異化勞動。現代大工業中可借鑒的例子是強調協調（軟化等級、多重角色、團隊作業等）、部門之間合作性競爭和技術的

學習傳播。農業、民生等更接近“自然”的行業當然也有利於開發直接勞動者和參與者的主體地位和意識。

其次，與集權傳統並行，中國自古又有分權和地方自治的傳統，其中的積極因素或可成為小康社會的組織資源。比如在許多領域中勞動者可以自行設計、自產自銷乃至直接消費自己的部分成果，並通過經濟民主的各種可能形式控制稅外剩餘，從而消滅剝削。較小規模的管理可支持直接民主，使人們對與自己利益相關的事物有發言權和決定權。大規模社會化生產也未必與大公司企業的基層分支採取相對分散的管理形式相矛盾，並且不排除衆多傳統與現代複合的“小生產”和分配方法，包括大量部分自給的農戶、合作社、半或全商品化生產的家庭作坊的存在。一種以人人有份的低保收入為後援的普遍參與的制度文化還有助於殘存的、以男性家長的收入為核心的家長制和族權的最後解體。同理，農田水利設施有時要求跨村、鄉、縣甚至省的統一動員組織，亦不與自治常態衝突。總之，以實現直接勞動者個人主體價值為目的的社會完全不同於內向、孤立，貧窮、封閉的“農業社會主義”。畢竟小康祇有在理想和實踐中與大生產、大市場和天下大同的眼界相連相通才能獲得現代意義。

再次，以互助共享和公共支持為特徵的小康型社會服務系統廉價高效，能便利群眾、節約資源。政府雖然有推行普遍福利的不可推卸的責任，卻不可能是大眾福利的唯一提供者。分工不同的家庭和集體網絡、互助互利的非贏利機構和民間社團等作用極大，如社區組織、小額貸款信用社、技術和市場服務合作社、綠色銀行等等。與政府職能並行的民間方法常能更經濟合理地提供從食品、衛生、住宅維修到產銷、公約公德、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服務。比如照顧老幼病殘的工作在鄰舍和社區內安排往往更容易，也更便於親情。其

中的勞動可有市場價格，也可以不進入市場，而用自願交換和自由流通的“義工存摺”、“換工券”、“代金券”等計算。如我星期天為小區的敬老院義務服務了十小時，在我的“扶老攜幼志願光榮”存摺上又增加了一個“10”印章。下個月我出差，在小區服務中心取出部分以前攢下的付出，請位義工早晚照顧我上初中的孩子。你在郊區植樹掙得的“綠色代金卡”可以繼續用植樹，掃雪、依環保條例處理可回收垃圾等勞動充值，用於在附近直銷有機農產品的商店換購新鮮水果和蔬菜。這類交換根據具體情況或個人、或社區、或地方合作組織、或政府管理，與使用一般貨幣的市場活動互為補充。在中國，國家投入加上集體主義的遺產，有可能在更大規模上再現和更新東亞式的“國家引導型社區福利”。不以錢為中心的生活和消費方式還有益於人際親和、環境保護。節能尚儉、多情多彩的生活其樂融融，無需在使用上並無必要的不斷換代的新產品和以破壞生態為代價的奢侈消費，減少對因多次轉手而價高的商品和服務的需求，也與貧富分化隔離的社會秩序格格不入。繼“防盜鐵門”普及之後，又有報載售樓廣告，竟公然分設“主人電梯”與“保姆電梯”。小康建設正是要改變這類無視平等人權的價值觀和可怕的資源浪費。

最後，小康圖景中參與和尊嚴，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自由和自治等內容都有賴於不同政治力量的消長，意味著輿論準備，政策調整，利益衝突、協商、談判和鬥爭。強大的既得利益也許會反對平民的小康運動。正是在這裡體現出因生產率提高而贏得的時間對政治參與的質與量的寶貴意義。所謂“時間和閒暇的政治”事關勞動日的長短，公民知情、公開討論辯論和參與決策的權利，休假的權利和生活質量，工會和其他社團活動的權利等。當然時間、閒暇等概念不是給定的。經濟增長與無數勞工擦肩而過，並沒有給他們

帶來應有的閒暇包括法定的假期。即使享受休假的人們，也常被與個人修整發展無涉的純粹的消費“商機”所利用。但祇要轉變意識，時間就與民主相輔，可以成為公民社會的節日。人們沒有了對缺乏基本生活需要的恐懼，才能成為自由自立自主的公民。

文化轉型

人類要求逐漸擺脫笨重單調、疲於奔命的生存方式，從而把工作與興趣統一起來願望在今天信息和自動化程度不斷提高的社會裡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接近現實的可能。一方面是“過勞死”，另一方面是實無必要、消磨時間又沉悶無聊的所謂“工作”，兩者到處都已成為道義的扭曲和理性意義上的時代錯誤。糾正這個錯誤意味著改變現代僱傭或工資勞動關係中的社會契約，從而對思想、價值和制度的慣性構成挑戰。既然充分就業已不再可能，而失業問題又必須解決，那麼唯一的出路就是迎戰。政策選擇的方向應是使基本需要和尊嚴與工資收入脫鉤，讓每個公民得到一份足以維持生存的社會收入或社會紅利，實現充分參與。

不過，當現存的社會勞動組織和個人與集體認同的職業基礎行將倒塌時，時代意識便發生危機。凱恩斯在大蕭條之後預見到由此將引起的“集體神經崩潰”，雖然他不曾預料走在前面的竟可能是當時在戰亂中非常貧困的、處於世界經濟邊緣的中國：

一旦財富的積累不再具有很高的社會重要性，一個道德觀念的偉大革命就到來了。……所有因其對資本的巨大功能、因其影響財富的分配和經濟的獎懲而無論怎樣不可取、不公正都被我們不惜代價地維持著的社會習俗和經濟實踐就要被我們最終的拋棄了。我們自由了。……我們將重新把目的和善置於手段和功利之上。我們將把榮譽獻給那些能教給

我們怎樣好好有意義地度過時日的人。……我因此渴望著那並不太遙遠的、人類生活的物質環境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變化的聚集和到來。……事實上，這一變革已經開始了。（1930年）

顯然凱恩斯從來不是一位烏托邦思想家，他的話並非空想。

此文論辯由於今日中國的條件使充分就業不再可能，而失業問題又必須解決，可行之途唯有使每位國民以參與者的身份（兒童應視為未來的參與者，失去能力的老人和殘疾人則是過去的或潛能受阻的參與者）得到一份足以維持生存的社會收入。使人們的基本生存需要和尊嚴與工資收入脫鉤正是實現充分參與的物質基礎。國家和社會現有的經濟能力已足以承擔全員社保；政治上且與追尋另類現代性的小康社會主義理想完全一致。從文章初稿（1997年）至今，幾年來受益於與朋友同行的探討爭論，也得到許多有關“自主創業”、“農民建新城”、“新鄉村建設運動”等討論的啟發。尚未說服自己的難點包括如何調和民族/地方性小康社會與全球化壓力的關係，社區發展與社會化生產和管理方式的關係，在資本統制和官僚統治兩者之間運轉的“共享”式經濟(solidarity economy)與國內國際市場的關係，以及實現公民收入財政上的具體計算和新舊體制銜接、轉軌的操作細節等問題。因為祇是一個初步的不成熟討論，希望得到讀者指教。